

文章编号:1674-8107(2016)06-0093-10

# “十七年”时期对国民党斗争题材小说的 流行原因探究

赵秋阳<sup>1</sup>, 谭光辉<sup>2</sup>

(四川师范大学 1. 国际教育学院; 2.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 要:** 以与国民党斗争为题材的小说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主要流行的一个小说题材类型。《红岩》的流行原因是它涉及权力斗争、人的尊严、酷刑展览等;《红旗谱》和《播火记》的流行原因是它涉及仇恨情绪、阶级对抗、激情斗争、爱情故事等;《林海雪原》的流行原因主要在于它的传奇色彩;《青春之歌》的吸引力在于它涉及个人价值在革命中的定位问题;《迎春花》在阶级斗争题材中赋予劳动人民美好的品质。“十七年”时期对国民党斗争题材小说流行的原因要素主要是阶级斗争、仇恨情绪、对严酷生存环境和个人顽强意志的展示、传奇与爱情、个人解放道路等。

**关键词:** “十七年”; 对国民党斗争题材; 流行原因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6.06.015

不论从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视程度方面看,还是从读者的选择方面看,表现对国民党斗争题材的小说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都是最重要的类别。

它们在宣传评价、印刷数量、经典化成就等方面都远远超过抗日题材小说和其他题材小说(参见下表)。

“十七年”时期销量排名前 20 名的小说印数统计表

| 序号 | 小说名      | 作者      | 初版   | 初版出版社  | 初版印数   | 统计未版年 | 版本及印次    | 总印数     |
|----|----------|---------|------|--------|--------|-------|----------|---------|
| 1  | 红岩       | 罗广斌、杨益言 | 1961 | 中国青年   | 不明     | 2009  | 4 版 90 次 | 3972650 |
| 2  | 红旗谱      | 梁斌      | 1957 | 中国青年   | 不明     | 2009  | 3 版 45 次 | 1974090 |
| 3  | 烈火金钢     | 刘流      | 1958 | 中国青年   | 不明     | 2009  | 7 版 38 次 | 1800750 |
| 4  | 红日       | 吴强      | 1957 | 中国青年   | 不明     | 2009  | 5 版 45 次 | 1656050 |
| 5  | 敌后武工队    | 冯志      | 1958 | 解放军文艺  | 不明     | 2007  | 5 版 12 次 | 1221500 |
| 6  | 青春之歌     | 杨沫      | 1958 | 作家     | 350000 | 2009  | 3 版 13 次 | 1083050 |
| 7  | 新儿女英雄传   | 孔厥、袁静   | 1949 | 海燕书店   | 5000   | 2002  |          | 981120  |
| 8  | 保卫延安     | 杜鹏程     | 1954 | 人民文学   | 100000 | 2000  | 2 版      | 910000  |
| 9  | 创业史(第一部) | 柳青      | 1960 | 中国青年   | 100000 | 2000  | 2 版 16 次 | 757500  |
| 10 | 铁道游击队    | 刘知侠     | 1954 | 新文艺    | 不明     | 2005  | 6 版 21 次 | 750020  |
| 11 | 林海雪原     | 曲波      | 1958 | 作家     | 20000  | 1997  | 3 版 23 次 | 744760  |
| 12 | 战斗的青春    | 雪克      | 1958 | 新文艺    | 不明     | 1964  | 3 版      | 741000  |
| 13 | 平原枪声     | 李晓明、韩安庆 | 1959 | 作家     | 不明     | 2005  | 2 版      | 590000  |
| 14 | 苦菜花      | 冯德英     | 1958 | 解放军文艺  | 不明     | 2007  | 3 版      | 583500  |
| 15 | 平原烈火     | 徐光耀     | 1950 | 北京三联书店 | 不明     | 2005  | 7 版 27 次 | 572500  |
| 16 | 迎春花      | 冯德英     | 1959 | 解放军文艺  | 不明     | 1991  | 4 版      | 432500  |
| 17 | 播火记      | 梁斌      | 1963 | 百花文艺   | 95000  | 1986  | 4 版 4 次  | 428000  |
| 18 |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 丁玲      | 1949 | 新中国书局  | 2000   | 2005  | 5 版 14 次 | 418000  |
| 19 | 暴风骤雨     | 周立波     | 1948 | 东北书店   | 不明     | 1977  | 2 版 20 次 | 400000  |
| 20 | 三里湾      | 赵树理     | 1955 | 通俗读物   | 300000 | 2005  | 3 版 5 次  | 352500  |

收稿日期:2016-09-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百年流行小说与大众文化变迁(1900—2010)”(项目编号:11CZW070)。

作者简介:1.赵秋阳(1973-),女,四川南充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2.谭光辉(1974-),男,四川南充人,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符号学、叙述学研究。

通过上述流行小说排行榜可以看出,该类题材小说排名靠前的是《红岩》、《红旗谱》、《红日》、《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迎春花》、《播火记》。其中,《播火记》是《红旗谱》的续篇,《迎春花》是《苦菜花》的姊妹篇。从印数上看,《红岩》和《红旗谱》的印数都超过了抗日题材小说排名第一的《烈火金钢》,《红日》也超过了在抗战题材中排名第二的《敌后武工队》。从经典化方面看,当代革命最重要的经典“三红一创,青山保林”没有一部属于抗日题材。八大经典中只有两部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六部属于对国民党斗争的题材。这些暗示了这样一个信息:不论是主流意识形态,还是人民大众,对国民党的仇恨超过了对日本人的仇恨,阶级情感的强度超过了民族情感的强度。当代大众文化认为,内战比抗战对人民大众获得解放的作用更为重要。

因此,对国民党斗争的小说的核心是阶级斗争,基本价值取向是证明国民党不适合领导中国人民,只有共产党才能使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这种价值情感取向演化为几种表达方式:一是揭示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迫害,二是揭示国民党政权的腐朽和统治的黑暗,三是用英雄们对国民党的态度代表全国人民的態度,四是将国共之争作为背景,突出表现共产党人品质的纯洁美好从而从反面映衬国民党的错误。这类题材主要从两个时期介入:一是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介入,二是从解放战争时期介入;下面按小说的重印次数和印数统计排名依次论述这些小说的主题情感特征。

### 一、《红岩》的流行逻辑

《红岩》是60年代以来中国最流行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其再版次数与印数稳居第一位。《红岩》在1961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1版,1963年2月第19次印刷至1 860 000册。到2009年8月第4版第90次印刷至3 972 650册。这个数据只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在版权页上的累计数据,实际印数可能远大于此,这些数据还不包括各种各样的改编本、缩写本、少数民族语言本、外文本、连环画本。黄子平在《“灰澜”中的叙述》一书中用一条注释说明《红岩》的印数:“《红岩》不到两年印行四百万册,创当时长篇小说发行的最高纪录,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都有人起早排长队等

候购买《红岩》。”<sup>[1](P12)</sup>但他没有说数据来自何处。许子东说:“《红岩》初版时印400万册,八十年代以后还印了800万册。”<sup>[2](P88)</sup>笔者不知许氏数据来自何处,但不论从出版社版权页标注印数看,还是从江湖传言印数看,《红岩》的印刷数量在同时代小说中都是稳居第一的。钱振文说《红岩》“创造了高达800万的发行数量”<sup>[2](P164)</sup>,但不知他说的是哪个阶段。《红岩》的影响是惊人的,《红岩》故事发生地成为当代革命历史教育基地,由《红岩》衍生的文化产业链无比巨大,由《红岩》而生的相关书籍数量也很大,至2013年8月,通过“读秀图书搜索”引擎搜索到题目包含“红岩”的书籍多达239种。通过“中国知网”篇名搜索,从1994年到2012年的文史哲类文章有近300篇,通过关键词搜索则有近500篇。

《红岩》写的是关于重庆地下党和被关在国民党设立在重庆的集中营渣滓洞和白公馆的共产党员在狱中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故事。由于这个故事太过普及,几乎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复述故事已经没有必要。我们关心的是,《红岩》到底是哪些元素对当代中国人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

我们发现,与抗日题材小说相比,《红岩》除了没有民族主义情绪,其他情绪都具备。仇恨、阶级情感、传奇性、英雄主义元素都有。仇恨的对象变了,变成单纯的国民党法西斯政权。传奇性有变化,不再是战争场面的传奇性,而是人物经历、命运的传奇性。坚韧、顽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坚定的意志,灵活的斗争方式,成为英雄主义的新内涵。除了这几点之外,我们还可以将《红岩》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作一比较,会发现二者有惊人的相似元素。

《古拉格群岛》写的是前苏联劳改集中营,《红岩》写的是国民党政治集中营。前苏联秘密逮捕政治犯,关在白公馆、渣滓洞的也都是政治犯。逮捕方式也很相近,二者都是秘密逮捕。《古拉格群岛》详细地描写了前苏联集中营内的生活,《红岩》也详细地描写了国民党集中营内的生活。两部小说的作者都有过在集中营中生活的亲身经历。二者的最大不同是,前者重点表现集中营对犯人的迫害,而后者不但表现集中营对犯人的迫害,更着重表现共产党员钢铁般的意志品质和反抗斗争。前

者在西方世界产生了极强的影响,震撼了世界;后者在中国产生了极强的影响,成为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象征。对这二者的共同元素进行比较,也许可以发现震撼人类心灵的某些共同元素。

一是权力斗争的深层内涵。权力斗争是人类无数争端的根源,几乎所有人类的争斗、战争、政权更迭、种族冲突、宗教冲突、性别冲突,无不是因为权力争斗所致。权力斗争的表层是肉体控制,深层是思想控制,控制与反控制几乎是一切戏剧冲突、人类冲突的基本着手点。因此,通过典型的、有现实根据的肉体、思想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来表现历史发展的形态、动力、方式以及人的灵魂状态、挣扎、信仰等重大问题,让人明白诸多人类历史发展的死结,就会对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红岩》通过真实的历史原型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反映了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表面看是一个国民党对共产党进行迫害的场所,但细究起来,其实是一个权力争夺的战场。反动派为了改变共产党人的思想、信仰,几乎用尽了可能想到的任何手段,身体折磨、精神摧残、引诱拉拢、分化瓦解……无所不用其极。共产党人为了不被改变,也采取了无数心理、行动抵抗措施。特务们处于控制别人的强势状态,共产党人处于抵抗防御状态,身体遭受极强的摧残,然而意志却永远不可改变。在《古拉格群岛》中,我们看到的是永远没有希望的黑暗未来,解释了权力斗争中处于弱势一方在没有希望的情况下的肉体、意志的消灭。在《红岩》中,我们看到人物因有一线希望的曙光而最终没有放弃,没有被改变,保证了对权力的持有。《红岩》解释了保证权力不丧失、在权力斗争过程中保证胜利的根本性元素:坚持、独立、信仰、意志。

二是人的尊严。共产党人坚强的意志,不仅保证了权力的存有,而且保证了人存在的尊严。人的尊严不是别人赋予的,而是自己争取的,人的尊严存在于自己的灵魂与行为之中,这是《红岩》揭示的第二个重要规律。重庆集中营中的共产党人是有尊严的,尽管他们受尽摧残与折磨,因为他们尽最大可能坚持了人格、信仰的独立性。《古拉格群岛》中的人物生活是没有尊严的,因为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他们的尊严彻底剥夺,但是他们对尊严的渴望却是一致的。这两部小说都在提示尊严之于

一个人的重要性,不论获得与否,尊严都是一个人的生存之本。二者都对剥夺人的生存尊严的行为进行强烈的控诉,只不过前者集中控诉强权,而后者给人提供反抗途径。

三是酷刑展览。酷刑展览让人看到的是暴力、血腥、罪恶,更让人看到施刑者人性中的罪恶面,解剖人性的邪恶面。《红岩》让我们在极端的环境与冲突中观察人生中的伟大面与邪恶面,让人明白崇高与卑劣的真正内涵,在酷刑中审视人类的伟大与罪恶。共产党人的伟大,通过多种处境得到展示,这里面包含坚定、友爱、团结、同情、理想、机智、忍耐、奉献、牺牲、柔情等等。反动特务的邪恶也得到全面展示,其中包含阴险、狡诈、残忍、贪婪、蛮横、血腥、卑劣、愚蠢、变态、冷酷等等。《红岩》不仅是一部革命历史传奇,更是一部人性中的善恶元素展览,这些展览隐藏在各种酷刑、屠杀、拷打、迫害之中。

由于《红岩》不仅仅在60年代流行,在新时期仍然有很高的印数,因此我们不能据此判断对《红岩》的接受只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它与《古拉格群岛》在西方世界的命运一样,它揭示了人类共性中的某些东西,它把人放在极端环境中拷问、审判,给人关于善与恶的价值观念。《红岩》讲的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事件,而人性的彻底暴露往往都发生在这些特殊的过程之中。

因此,我们会发现隐藏在国内革命战争小说中的另一条隐秘规律:该类小说着重从人性善恶的维度入手,突出共产党人的善而彰显敌对阶级人性的恶。这一点与处理抗日战争题材小说的方式很不一样。在塑造日本军人形象的时候,我们更强调我方人员的机智、勇敢、顽强,一般不刻意突出敌人人性深处的罪恶成分。日本侵略者被看作一个整体,有名有姓的军官的形象也很概念化,情感特征较为模糊。但是在处理国内战争题材的时候,情况就很不一样,反面人物的人性恶被强调突出,而其解释往往是:人性之恶源于阶级之恶。即便在抗日题材小说中也是如此,日本人的性格特征不鲜明,而汉奸、叛徒、伪军头目的人性部分就会被有意识地加以刻画。《红岩》中特务的人性恶的一面就被表现得很充分,在下面将要讨论的几部小说中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红旗谱》中的冯老兰、《红日》中的张灵甫、《青春之歌》中的余永

泽、《林海雪原》中的坐山雕等形象,都有鲜明的人性恶特征。这种处理方式可能是在作家无意识之中进行的,但是正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动作,才让我们看到文化元语言的巨手在如何雕刻人的心灵。

## 二、《红旗谱》《播火记》的革命方向

《红旗谱》写的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故事,故事的背景年代更远一些,但是它的基本情绪状态与《红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若细加考察,《红岩》所具有的三个核心元素在《红旗谱》中也可以找到。

《红旗谱》1957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初版,1959年9月第8次印刷至657 000册。2009年8月第3版第45次印刷1 972 091—1 974 090册,印数仅次于《红岩》,在“十七年”小说中排名第二。除此之外,《红旗谱》还有多种缩写本、连环画本、评剧本、电影文学剧本、插图本、百花文艺出版社本等等,总印数已很难统计。有的印数很多,例如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出版的连环画,第1次印刷数量就达231 000册。有资料显示,《红旗谱》的印数1977年第四次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时“该书已是第十九次印刷,印数高达500余万册”<sup>[4](P149)]</sup>。《红旗谱》的影响确实很大,还长期被节选入自考教材或其他当代文学作品选教材。《红旗谱》所述的故事事实上缺乏生动性和曲折性,叙述混乱不堪,有些地方甚至缺乏基本叙述和写作常识,<sup>[5]</sup>其可读性远远不及《红岩》,甚至不及《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作品,但是它却成为销量与影响仅次于《红岩》的小说,实在有点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红旗谱》主要是描写农民自发地反抗地主、国民党统治和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的故事,描述锁井镇一家三代反对地主、寻求解放的斗争道路。《红旗谱》的故事基本上属于编造,是为政治概念写作的,缺乏生活基础和细节观察,笔者基本上赞同王彬彬对《红旗谱》在艺术方面的看法,但是问题也从此处展开。恰如王彬彬在对《红旗谱》

的细读过程中发现的那样,《红旗谱》版本混乱,不断修改调整表述,但却仍然无法避免写作上的硬伤;作者缺乏基本的想象与虚构的能力,情节前后矛盾,前言不搭后语,写第二句忘了第一句。但是非常奇怪的有两点:一是为什么出版之后如此轰动,受到读者如此追捧?二是为什么这样的作品竟然还能在文学史上获得众口一致的好评?

对第一个问题,答案只能是这样:读者大众心地单纯,并没注意《红旗谱》在叙述方面的不精密导致的虚假,一种更强大的情绪遮蔽了他们对细节的注意。我们可以很明确地注意到,《红旗谱》一开篇就弥漫着一种仇恨情绪,叙述者用一种稚拙的手法煽起仇恨。《红旗谱》煽起仇恨情绪的手法并不高明,理由牵强不可信。例如,小说开始应该写的是20世纪头十年的事<sup>①</sup>,这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地主”这个概念,更不会有“恶霸地主”这个概念,但是小说第一句话就称冯兰池是“恶霸”,朱老巩死的时候称冯兰池等人为“土豪霸道们”,想是为了避免出现“地主”称谓,可是没有出现地主之前,“土豪霸道”这个词也是没有的。而且,朱老巩还有自觉的阶级意识:“土豪霸道们,靠着银钱、土地,挖苦咱庄稼人。”这个词从朱老巩口中说出来,就显得很不真实。《红旗谱》的人物口中充斥着这种后设概念,经不起推敲之处甚多。但是人们却看不见这些部分。看不见的原因,是因为注意力不在此处,而另外一种更强烈的仇恨情绪转移了读者的注意力。仇恨的本质是偏见,例如仇恨犯罪就被从本质上定义为“由偏见引发的犯罪行为”<sup>[6](P12)]</sup>。正因为仇恨引发偏见,偏见让人看不见意识的反面,所以《红旗谱》煽起的仇恨意识就能够让读者不再关注它文本技巧的拙劣。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诸多文学批评家也看不见这些缺点?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学院知识分子被大众化经典同质化的结果。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精英知识分子的方式,一种是大众的方式。知识分子遴选经典的方式是纵聚合轴上的比较操作,大众的方式是横组合轴上的连接操作。比较操作,就是把作品放在历史、现实的

①这个判断有几个证据:第一,人们都还留辫子,说明还在清朝,把朱老巩骗出砸钟现场的严老尚“庚子年间,当过义和团的大师兄”,听语气应该是1900年之后多年(义和团运动发生在1900年)。第二,朱老忠三十年后回到锁井镇,而这个时候应该是在三十年代初期。第三,朱老忠回到锁井镇的时候,大贵还是小孩子,至少要几年之后才可能参加这些运动。反割头税发生在1931年,保定“二师学潮”发生在1932年,据此推算,朱老忠回乡不会晚于1930年。这样,在时间上就存在一个矛盾,朱老巩大闹柳树林到底是在1900年之前还是之后?

总体系中,不断比较,选出经典。大众的方式是靠口耳相传,相互推荐,靠销售量、点击率将作品经典化。从畅销书的产生方式来看,畅销书是典型的大众化经典操作,是靠销量、影响、传播的结果建构起来的经典。当知识分子丧失了自己的立场,不再对作品进行比较,而是只停留在对大众经典的阐释上时,一个文化的危险也就由此而生。横组合轴让我们看到文本与大众之间的关联,纵聚合轴让我们看到文本深处的文化元素;纵聚合轴上有历史文化的投影,而横组合轴上有人们现实处境的投影。这二者都对人的生存有重大的意义,是人身份存在的依托。只有纵聚合轴而没有横组合轴,人的身份便失去现实联系,人会感到恐慌;只有横组合轴没有纵聚合轴,人的身份便失去文化根基,人就会感到漂浮。二者对人生各有意义,双轴是并存的。假若一个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完全向横组合轴倾斜,那么整个文化体系趋向于平面化,整个文化系统就失去根基。

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之后,紧接着的问题便是:到底是什么元素使大众对《红旗谱》如此着迷?我们能够给出的解释是:《红旗谱》中那些能够掩盖其叙述缺陷的强烈情绪,就是它流行的原因。这些情绪包括仇恨、阶级对抗、充满激情的斗争、爱情故事。对地主阶级、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强烈仇恨是本时期宣传工作的主流,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常规意识形态。在大多数的大众宣传文献中,一旦提到“国民党”必冠“反动派”三字,不断暗示强化了这一认识,因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已然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50年代初期的土改斗争,将地主阶级消灭,对地主的负面宣传也将仇恨地主的价值判断固定,深深地植根在大众潜意识中。50年代初期,人民对地主为什么坏、国民党反动派为什么坏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史铁生在《奶奶的星》中写到1972年时的情况,“譬如说奶奶,她还不懂白地主为什么坏,就注定是地主了”<sup>[7](P155)]</sup>《红旗谱》类型的小说为地主、国民党的“恶”提供了形象的解释,这类小说能够解答普通人心中的巨大疑问,能够帮助他们赶上时代的政治、文化认知水平。阶级仇恨与阶级对抗并不是人固有的价值观和认知标准,它需要培养、引导,还需要形象的解释。1950年代至1970年代,阶级教育成为教育中的重点内容,一篇载在《人民教育》1963年10月

号的文章中写道:“那自然要告诉孩子,谁是地主,为什么坏,谁是贫农,为什么好,诸如此类等等逐渐把阶级斗争的教育渗透进孩子的心灵,以后孩子凡看到这类电影或阅读书籍的时候,在他那小小的心灵里就亮堂得多了。”<sup>[8](P137)]</sup>阶级教育、政治教育是建国后几十年内的宣传主题,然而大量的、铺天盖地的阶级意识宣传并不能彻底地改变人们的认知,小说却能够通过形象的、激情的叙述将这种认识自然化,解答大众认识过程中的疑问,所以《红旗谱》一类的小说就能够彻底地满足这种需求。同时又因为这类小说在情绪上与大众已经形成的阶级情感一致,所以能够引起共鸣。

《播火记》是梁斌《红旗谱》的续篇,是《红旗谱》第二部。作家出版社1963年12月北京第1版,196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151000册(其中1000精装)。百花文艺出版社1963年11月第1版,1963年11月第1次印刷95000册(其中5000精装),1986年1次印刷2000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9月北京新1版,197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180000册。总的来看,《播火记》的销量远远不及《红旗谱》。虽然《播火记》在题材上是《红旗谱》的延续,且在写作方面并不存在明显的与《红旗谱》不一致的缺陷,然而后者的热度总是赶不上前者。这一现象恰如冯德英的《迎春花》、《山菊花》的销量不如《苦菜花》。读者对一个新鲜的题材有新鲜感,但是如果只有题材的延续而无更新的思想与更吸引人的故事出现的话,它就必然遭到读者的抛弃。《播火记》写的是保定二师学潮被镇压之后,朱老忠等人在农村开展农村暴动起义及之后的一系列斗争的故事。朱老忠回村组织建立华北工农红军准备暴动,朱大贵在短工市场与冯老兰的儿子冯贵堂展开争取工资的斗争并取得胜利,贾湘农组织红军,举行了蠡县暴动,杀死冯兰池,起义取得胜利。地主勾结国民党武装镇压起义,一批红军战士牺牲,革命家属被捕,革命力量转入地下,朱老忠坚持地下工作,朱大贵带领游击队进入太行山,革命种子被播撒在滹沱河两岸。《播火记》也有生动的战争场面,但是与《红旗谱》相比,一是少了新鲜感,二是少了民间气,三是少了被正常发行的时间。小说出版后两年,文化大革命到来,这些小说都失去了出版的机会。

《播火记》的流行原因与《红旗谱》基本上是一

致的:阶级感情与革命情绪的渲染,吻合了大众文化心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两部小说基本上都被放在一起被批判,例如《河北日报》评论员的批判论文《向反动小说<红旗谱><播火记>开火》、冀红文的批判论文《评为王明路线招魂的反动作品<红旗谱><播火记>》等。<sup>[9](P514-515)</sup>《播火记》销量不如前者,一方面是由于它是续篇而失去了题材新鲜感,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到来使其失去了出版机会。

### 三、《林海雪原》的传奇色彩

《林海雪原》不涉及宣传仇恨地主阶级,但是涉及国民党残余匪类,仇恨情绪已退居幕后,仇恨已经成为前提,主题是战争的传奇方式,而且“战争的‘欺诈’与‘暴力’是被美学化了的”<sup>[10](P188)</sup>。

《林海雪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9月出第1版,1962年9月第2版,1964年1月第3版,1997年5月第23次印刷至744760册,2004年3月第1版印5000册,2004年10月10000册,2005年7月第3次印刷18001—28000册。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5月1版印数不明,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6000册,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印3000册。《林海雪原》还有许多其他版本,异常混乱。单就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而言,就已经混乱不堪,由于作者修改了数次,有不同的版本,而且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时候也没有让印数有连续性,21世纪再版时的印数根本就不标注依据的哪一个版本,2005年7月的第三次印刷也不知道前几次印刷的是哪一个版本。大体上来说,1997年5月版上注明的第23次印刷本应该较具连续性,加上其他版本,《林海雪原》的印数大约应该在一百万左右。然而据一份资料显示,“《林海雪原》至今,该书已被印刷300余万册”<sup>[11](P169)</sup>,可能是加上连环画、缩写本、外文本等其他印数的估计。陈霖的统计是“《林海雪原》在出版后一年的时间内,印刷七次以上,印数近百万”。<sup>[12](P163)</sup>《林海雪原》的准确印数,可能永远是一个谜团。但是它家喻户晓的畅销情况却是不可否认的,这既有之后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功劳,又有小说本身的独特吸引力。

《林海雪原》的亮点和独特性,在于它的传奇色彩。其政治主题与其他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差异不

大,但它的独特处却在于其惊险、曲折的传奇故事。“《林海雪原》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描写战争时采用了虚实结合的方法,二是小说叙事上的传奇性。”<sup>[13](P73)</sup>小说描写了一个小分队以弱胜强,捣毁敌匪老巢的故事,塑造了充满传奇色彩而又性格鲜明的英雄形象,还描写了一段英雄之间的爱情故事,使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确立的“革命加恋爱”的小说模式得以继承。当时的批评家李希凡的看法与此一致,他认为《林海雪原》第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富有传奇性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艺术特点”<sup>[14](P305)</sup>。张炯认为《林海雪原》等小说“因其通俗性和传奇色彩而受到普遍欢迎”<sup>[15](P122)</sup>。另一方面,《林海雪原》比较突出的特征是对孤胆英雄的塑造,这就让小说带上了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李希凡说:“它可以启示读者去了解,在伟大的解放战争的年代,如果没有这样的大智大勇、英雄无畏的革命战士,是不可能取得胜利,不可能保卫住人民的胜利果实的;没有共产党的教养,也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战士。”<sup>[14](P308)</sup>由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并没有形成“文革”文学那样全面的集体英雄主义宣传模式,所以个人英雄主义还有广泛的群众心理基础。第三方面,《林海雪原》在高扬英雄主义的同时,表达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情绪。朱德发等人认为,《林海雪原》等小说“更不缺乏政治话语,尤其在话语的表层,政治性话语更是占了小说话语的主导地位”<sup>[16](P228)</sup>。

总的来说,《林海雪原》的流行原因,主要是在英雄主义、仇恨情绪的基础上增加了传奇色彩,而传奇色彩大概是其流行的主因。本文仅提供一个观点:《林海雪原》的传奇模式与新中国建国之后的社会情绪与意识形态有一个合拍的方面——智慧。新政权建立之后,宣传的集中点是政治的方向性,坚定的信仰、坚强的意志是被歌颂得最多的,而对智慧的宣传是不够的。《林海雪原》通过与敌人斗智斗勇的精彩情节描绘,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斗争方式。《林海雪原》的总销量并不如《红岩》、《红旗谱》等,也说明在人们的文化心理中,对智慧与机智等因素的重要性认识并未强过前者。

### 四、《青春之歌》的人生选择

与《林海雪原》相比,《青春之歌》就缺少传奇色彩,故事的曲折性也不如前者,而且它也不像

《红岩》与《红旗谱》那样有极端、壮观的斗争场面,支撑《青春之歌》流行的因素是爱情故事与政治方向的痛苦抉择。

陈霖对《青春之歌》的销量统计是,“像《青春之歌》,1958年初版后,仅一年半的时间就售出130万册,成为在这期间长篇小说中仅次于《林海雪原》的畅销书。”<sup>[17](P125)</sup>但是从版权页上的标注印数来看,《青春之歌》的总体销量要高于《林海雪原》。

《青春之歌》由作家出版社1958年出第1版,首印350 000册。1959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电影剧本,印数39 000册。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版,1990年10月第11次印刷至653 050册,2009年8月再版4 000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1996年2月第4次印刷至61 000册。1998年1月第1版,2004年第2版第7次印刷印数不明。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7月1版,2001年4月第2次印刷至15 000册。

由于初期版本有几个版本未标印数,因此造成该小说60年代初期的印数总量不明。无论具体印数销量是多少,《青春之歌》出版之后即成为新中国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它不仅仅是大众层面的畅销书,而且是学界重点关注的对象。王永生1958年写《谈小说“青春之歌”》,1958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78年扩充内容成《小说<青春之歌>评析》,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出版。傅守祥、刘和椿为其编《<青春之歌>导读》,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海南出版社2002年收入《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更有甚者,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专门为其出版《<青春之歌>词汇表》,小说还被大量改编成电影、话剧、连环画、缩写本、京剧等体裁,影响极大。

《青春之歌》与上述具有战争场面的小说题材差异较大。虽然《青春之歌》写的也是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题材,但是它揉合进了个人生命发展与革命之间紧密联系的元素。将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的小说在建国之后并不多,这就造成一个空档。这个空档填补上一个解释裂缝:个人的存在价值问题。当代文学史在叙述这一问题的时候基本趋于一致,例如王嘉良主编的文学史的叙述:“一切追求光明和进步的知识分

子,只有把个人前途同国家民族的命运,同人民的革命事业结合在一起,勇敢地投入到时代的革命洪流中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是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才有真正的前途和出路,也才有真正值得歌颂的美丽青春。”<sup>[18](P464)</sup>几乎凡是看过《青春之歌》的小说和电影的人都会得出类似的结论,然而这是从教育意义上来谈的结果,而不是从原因层面来分析这一结果对大众的吸引力。

按照索绪尔对语言符号“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的分析,符号学界将一个文本看作是一个组合轴和聚合轴的操作。人的自我也是一个符号文本,那么一个人也就具有组合轴与聚合轴的操作,任何人都既是组合轴上的存在,也是聚合轴上的存在。聚合轴让人与历史、文化、多重自我联系,组合轴让人与社会、社会上其他人相联系,人可以在组合轴上被辨认,也可以在聚合轴上被辨认。但是倾斜的轴让人单面化,人最终找不到自己的文化位置。但是,如果强化某一轴,也可以使人找到一个文化身份,使自我的价值不至于落向虚无。新中国强大的集体主义宣传使五四以来确立的个人主义立场遭到彻底破坏,知识分子和精英立场被否认,历史文化附加的文化身份被消灭,人成为社会、革命的一颗螺丝钉,而整个社会都是由同质化的身份构成,人因此而失去了辨认自我身份的依据,存在价值落向虚无。《青春之歌》提供了这样一个对身份确认的引导和解释:人的聚合轴,是伟大的革命事业,革命的立场,在聚合轴上的选择操作中,有多种可能性存在,人的选择定位人的政治文化身份,选择后的身份上留下了聚合轴上的其他投影;人的组合轴,是个人与其他人的复杂关系,只有在一个好的组合关系中,人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身份。不论是聚合轴还是组合轴,身份的确认都要依赖个人的正确选择。那么这个正确的选择是什么呢?《青春之歌》给当时身份迷茫的人们一个指引,这个指引将两个轴合并成一个轴:只要选择将自己投身到革命之中,那么人既在聚合轴上的选择操作中保持正确,又在组合轴的连接操作中使身份固定。这样,《青春之歌》就将人的复杂身份通过简单的操作固定。人的意义和价值完全在于他是否与革命、革命者联系在一起。在伟大的革命洪流中,人的身份得以确立,这无疑给身份处于困惑中的人们一个重要的答案,而这个答案也

是意识形态所希望的,按照这种方式得到的身份既能给自我一个身份定位,又能与时代大流相吻合。

但是,这种将人的身份的双轴操作变为单轴操作的动能给人的身份确立一个巨大的危险:人不是因此而变得具有更多可能性,而是变得更加片面化。人在单轴操作的过程中事实上失去了聚合轴上的多种选择可能,于是越来越趋于失去选择,靠与他人的连接关系而确认身份,人的个性不是越来越强,而是最终被磨损得难于辨认。例如林道静并非因为知识、学养、文化能力的提升而确定身份与价值,而是在与不同的男性的交往过程中才使自己的身份选择变得明确。结果是我们不得不靠卢嘉川、江华等人对她的关系来了解林道静的人格,而不能依靠林道静本人的言论、思想来认识她思想意识的深度。组合轴上的单轴操作简单易懂,是大众文化的基本形态,因此,《青春之歌》是符合大众文化传播模式的典型文本。本章所涉其他小说也符合大众文化传播的模式,只不过在文本内部,《青春之歌》这一特点表现得特别明显。

除了上述因素,《青春之歌》在革命的背景处理中,仍然是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作为前提设置。对国民党的斗争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而是一个非反不可的前提,但是这个前提已经成为一个背景,是被“自然化”了的潜在台词。《青春之歌》对大众的强大吸引力,不在于此,而在于单轴操作的简单化造成的人对自身身份认识的方便与快捷。

## 五、《迎春花》的阶级斗争

冯德英的《迎春花》是《苦菜花》的续篇,但是它写的不是关于抗日战争的故事,而是关于解放战争的故事。《迎春花》解放军出版社1979年10月3版印数100 000册;1986年10月第4版,印数362 001—371 500册;1990年4月第4版,1991年5月第5次印刷,印数421 501—432 500册;1995年2月第5版,12月北京第11次印刷,印数492 001—503 000册;2007年第7版,印数5 000册;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印8 000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印数记录应该是保持了连续性的,至1995年,该小说总印数至少应该有50余万册。

《迎春花》描写的是胶东乳山县山河村在解放战争初期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之间的搏斗过程,描写村支书曹振德率领贫下中农与地主阶级展开的复杂斗争和地主阶级与叛徒对革命势力进行的破坏,反映了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小说的核心着力点在于表现农村中复杂的阶级分化和不同政治选择,表现反动地主和暗藏敌人与共产党之间的角逐与斗争。小说塑造了村支部书记曹振德的光辉形象,他发动群众反霸、土改、入伍,与以蒋殿人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破坏革命的行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与以孙承祖为代表的特务战斗,最终取得胜利,小说在我军向国民党反动派大反攻的炮声中结束。小说涉及人物较多,但是形象不够鲜明。与前述小说相比,小说的传奇色彩较弱,可读性不是太强,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小说中,属于特色不太鲜明的小说,虽然写作技巧较《苦菜花》有所提高,但并不如《苦菜花》那样广为人知。尽管《迎春花》着力于表现根据地共产党对敌斗争的艰苦卓绝,仍然未逃脱被批判的命运。武汉大学中文系62级写了一本《十七年百部小说批判》,其中有《苦菜花》也有《迎春花》,认为《迎春花》是大毒草,“严重地歪曲了解放战争初期胶东根据地人民为粉碎蒋匪军重点进攻而英勇斗争的历史”,把地富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破坏生产、土改、支前的活动力量写得过于强大,而我党农村干部则“被歪曲得不成样子”,我方常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从而为阶级敌人张目,长敌人志气”<sup>[19]</sup>(P16-17)。从造反派荒谬可笑的评论中,我们可以从侧面了解本作品的主要特点:小说重点在于试图用曲折复杂的斗争和故事情节,表现根据地在解放战争中的复杂社会关系和工作难度,表现劳动人民思想改造工作的艰难等问题。冯德英的重要作品(被称为“三花”的《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都有这一主题,革命与反革命阵营在生活中并不是十分明显,斗争充满了人情关系和复杂纠缠的社会关系。

不论怎样,相对而言,《迎春花》仍然排在流行小说排行榜的前列,处于第16位。它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销售业绩,与其前文本《苦菜花》的流行是分不开的。除此之外,它也吻合了当时的大众文化心理特征,其中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地主阶级的仇恨。另一方面,小说充满了坚

忍不拔的革命意志和革命精神,有着对英雄主义的另一种解释。冯德英曾说,他的“三花”是“因为它们所描述的民族精神、民族意识,是永恒的,是我们的支柱。它所代表的那一段段历史,我们永远不会忘记”。<sup>[20](P163)</sup>谈到写作“三花”的中心思想,冯德英自述是“怀着对革命人民浓烈真挚的感情,去讴歌他们纯朴的品质,崇高的情操,茹苦含辛、前赴后继、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有这样的人民,只要能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有什么美好的目的不能达到呢!这是我写‘三花’的中心思想和用意吧”。<sup>[21](P307)</sup>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迎春花》的创作出发点,与本时代的要求和大众文化特征高度一致。

## 六、结论:对国民党斗争题材小说的流行共性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流行小说主体是对国民党斗争题材的小说。虽然这些小说风格各异,但是又表现出了比较集中的共性。最明显的共性是对阶级斗争和阶级仇恨情绪的渲染。不论上述哪一部小说,贯穿始终的都是阶级斗争主线,这条主线是小说矛盾冲突展开的依据。没有这条主线,小说几乎无法进行。所以,该类题材小说的流行正好说明,在大众层面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统一的阶级认同观念。这个观念是党在比较长的时期内通过意识形态教育取得的显著成效。其次是对严酷生存环境的展示和个人顽强意志的颂扬。在阶级斗争过程中,人们必然要面临严酷的斗争环境。这不但需要正确的路线认识,而且需要坚强的意志,美好的品质。阶级斗争最终取得了胜

利,所以这些故事就生动地展现了这些优秀品质的作用,也就变相地歌颂了劳动人民的伟大。无疑,大众读者可以从中得到满足感,因为多数读者属于劳动人民的一员,每个人都是英雄。再次是英雄主义。20世纪50、60年代的多数小说都有昂扬的英雄主义色彩。不论哪种英雄,都是平民出身,因此英雄就与劳动大众有着同一性关系。与上文所述一样,这个时期的英雄主义也是平民主义,非常容易唤起广大人民的共鸣和满足。第四是传奇的色彩和对爱情故事的描写。事实上,除了《林海雪原》有特别明显的传奇色彩,其他几部小说同样具有传奇色彩,只不过这种传奇色彩显得更为隐晦。对广大劳动人民而言,革命生活离他们事实上很远,他们通过这些故事,了解了革命过程中的诸多具体细节和英雄传奇经历,具有新鲜感,同时也具有冒险性和猎奇性。革命者的爱情经历,更是劳动人民没有体验过的另一种传奇经历。上述诸种特征,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大众文化心理的普遍特征,给这个时期的小说打上了鲜明的文化标记。

这些因素其实都指向一个共同的东西:个人的解放与阶级的解放之间的关系。这些小说表面上都在谈阶级解放,然而事实上是在谈人的解放。其逻辑关系是:只有社会解放了,个人才可能得到解放。所以,个人才会以如此高昂的热情投身到伟大的社会、阶级解放的事业之中。这是这个时期小说的一种普遍的文化元语言逻辑。这就说明,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人的解放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但是人的解放的方式,已经从个体解放向阶级解放的方向发展了。

## 参 考 文 献

- [1] 黄子平. “灰澜”中的叙述[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 [2] 许子东. 四部当代文学史[A]. 王德威, 陈思和, 许子东. 一九四九年以后当代文学六十年[C].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
- [3] 钱振文. 《红岩》是怎样炼成的: 国家文学的生产和消费[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蠡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蠡县文史资料[M]. 内部出版, 1991.
- [5] 王彬彬. 《红旗谱》: 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十七年文学”艺术分析之一[J]. 当代作家评论, 2010, (3).
- [6] [美]詹姆斯·B·雅各布, 吉姆伯利·波特. 仇恨犯罪: 刑法与身份政治[M]. 王秀梅 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7] 史铁生. 奶奶的星[A]. 中国作家协会. 1984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C].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5.
- [8] 敢峰. 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 [A]. 袁振国. 中国当代教育思潮[C].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1.
- [9] 刘云涛, 郭文静, 等. 梁斌研究专集[C].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6.
- [10] 姚丹. “革命中国”的通俗表征与主体建构:《林海雪原》及其衍生文本考察[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11] 郑明珍,柳新华.名作遗后世 虎胆励来人——记《林海雪原》作者曲波[A].名师与校友:鲁东大学 80 华诞纪念[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
- [12] 陈霖.文学空间的裂变与转型:大众传播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大陆文学[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
- [13] 方维保.现当代文学名作欣赏[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
- [14] 李希凡.关于《林海雪原》的评价问题[A].李希凡文集:第四卷[C].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4.
- [15] 张炯.中国文学通史:第 11 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 [16] 朱德发.现代中国文学史精编(1900—2000)[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
- [17] 陈霖.文学空间的裂变与转型:大众传播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大陆文学[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
- [18] 王嘉良,金汉.中国现当代文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5.
- [19] 武汉大学中文系 62 级.十七年百部小说批判[C].武汉:湖北省文联红色造反团,1968.
- [20] 逢金一.欲望的舞蹈:当代文化批判[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
- [21] 冯德英.关于“三花”的创作答读者问[A].牛运清.长篇小说研究专集:中册[C].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

## Reasons for the Popularity of Stories about Struggle against Kuomintang in the "Seventeen Years"

ZHAO Qiu-yang, TAN Guang-hu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China;

School of Literatur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China)

**Abstract:** Story about the struggle against Kuomintang is a genre of novel popular in late 1950s and early 1960s. The novels enjoy their popularity then for different reasons. Red Rock is for its narrative of power struggle, human dignity and revelation of cruel torture; Keep the Red Flag Flying and Sow Fire Down for its telling of hatred, class antagonism, emotional struggle and love story, Tracks in the Snowy Forrest for its romantic legend, Song of Youth for its meditation on the position of individual in revolution, and Winter Jasmine for its presentation of the virtues of working people. In summary, those anti-Kuomintang novels in the "Seventeen Years" are popular mainly for their elements of class struggle, hatred, severe living situations, tough individual wills, legend and love stories as well as individual liberation.

**Key words:** "Seventeen Years"; story about the struggle against Kuomintang; reasons for popularity

(责任编辑:刘伙根,庄暨军)